

20世紀

SHEHUIXINWENXIAOSHUO

鐘道新 著

社會新聞小說

股票大亨的兒子



股票大亨的兒子

鐘道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我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股票交易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股票，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四十年：当年上海滩的股票大亨几经磨难，而今垂垂老矣，在参禅悟道中安度晚年。但他的儿子常锐却执意继承父业，南下特区，在S市新开张的股票交易所里大显身手，转瞬之间便腰缠万贯；也曾一觉醒来又濒临破产……

钟道新的这部长篇小说，着力描写了股票交易的风云诡谲，刻划了常锐等一系列当代文学中全新的典型形象，揭示了从中央到省、市各级领导层中围绕是否开放股票交易所这一尖锐课题而产生的复杂纠葛。

关心股票的朋友，请阅读这部近乎纪实的小小说，你必能从中获得可贵的启发。

股票大亨的儿子

钟道新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1.8 插页2 字数141,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6-1091-0 / I · 1000 定价：4.80 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第 一 章

“你这身打扮，叫我怎么陪你逛商店？”郭夏对丈夫说。

“你不要把话反过来说，是我陪你逛商店，而不是你陪我。”常锐只穿着一条很短的裤衩，一件廉价的T恤，一双过时很久的凉鞋，站在贸易大厦的入口处。他没有像一般年届四十的男子一样地“发福”，腹部依然平坦，好像涂有一层黄色的保护油的微黑的皮肤下，蕴藏着丰富的精力，似乎时刻喷薄欲出。只是头发略有些稀疏，但这亦可以解释成智慧的外在表现。“女人就是女人，就连撒切尔夫人，在有记者问她时，她也说最遗憾的事情是：不能亲自去逛商店。她逛遍全世界也还嫌不够。”

“可你就不能穿得整齐一些吗？”

“衣冠楚楚的人不是骗子，就是花花公子和伪君子。不过我发表严正声明：倘若出席你第二次婚礼的话，我肯定会穿得很像样子的。”

“缺德！这可是全国最大最高的商店。”

难道最大最高就是最好？常锐永远对女人的逻辑感到惊讶。在以惊人速度上升的电梯中他脸朝外看着。S市是一个相当奇妙的城市。它地处南国前沿，像刀尖一样地插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地缘和人缘的交叉作用，使它成为一个混合体。在概念上你也很难将它归类：特区？特区是什么？特区就是S市。S市就是特区。这是一个悖论。是悖论也罢，不是悖论也罢，反正它以令人惊异的速度繁荣起来。繁荣总比贫穷好，这条真理近几年来渐渐地被中国人认识到了。

郭夏逛商店有一个特点：从高往低。常锐痛苦地追随着。

“你看这个怎么样？”

“很好。”他知道妻子要的不是意见，只是反应。

“它的包装有多漂亮！”郭夏由衷地赞叹后，买下了这盒化妆品。

包装代替了内容，模糊了内容。它使质量变成了一种主观印象：你在同样的地方，放上同样包装但内容不同的东西，她也一定会买下。她买的其实是包装。包装就是商品本身。常锐没有敢把这话说出来：女人一旦生了气，她们不是去喝酒、去打牌，而是以十倍的热情去买东西。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

一个女导游领着一群显然是来自内地的游客，不停

地用麦克风叫他们跟上。

这就像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常锐想道。

“这个手提包的颜色和我那件上衣非常相配。”郭夏反复地端详着一个羊皮手提包。

“我想把它买下。”

“我实在不理解你这个‘相配’的概念有多大的内涵：有了一件上衣，就要买一个与之相配的手提包。然后又要株连皮鞋、围巾。可如果你买了一张床铺，必然要有相配的地毯和窗帘……你就这么配啊配啊，等你配到最后就会发现睡在你旁边的人与你不相配了。”

郭夏根本不理他。仍然不停地往小车里放东西。

常锐很省力地推着由闪闪发光的不锈钢和高级轴承组合起来的小车。就像一个囚犯走在流放的路上。“自选”真是一种革命性的发明：在这里一些东西都摆出一副任你拿的样子，可你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往往是超出你想象的代价。在结账处常锐机械地付着钱。

在底楼郭夏看中了一条裙子。常锐虽然对衣饰毫无研究，但已经从“皮尔·卡丹”这几个字上分析出它便宜不了。但他没有反对。

“这裙子的确不错，可似乎超出了咱们的购买能力。”

在郭夏说这话时，一个容貌相当丑陋身材处处可删的女人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条。

“当造物主没有给人以什么优点时，衣服就变得格外

重要起来。”常锐庆幸这个女人的出现，使他能及时创造出一个理论。“或者换一句话说：只有有重大缺陷的人，才需要打扮。”

“可她毕竟有一条心爱的裙子，如果不是太贵的话。”郭夏恋恋不舍地放下裙子。

“你买吧。算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常锐受到刺激：作为一个男人，必须保障妻子的消费。

“就是。我一年不才一个生日吗？”常锐的话立刻得到反馈。郭夏付了两百元。

幸亏你一年才一个生日。常锐把空荡荡的钱包用力地合起来。“我现在体会到当财政部长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角色：你只负责筹款，而如何用，则根本作不了主。”

“如果你是日本财政部长，就是一件很来劲的事。”郭夏也很有些机智。

“那他也得听首相的。”

郭夏去接电话时，常锐擦完汗，光着上身来到客厅。

他的岳父郭天谷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按道理它早该完了。他是一个不看中央台新闻的人。这样的人在S市大有人在。可郭天谷却是一个必须看的人。不过这并不矛盾：录像机正在录着“亚洲台”的新闻节目。高技术能够缓解和掩盖矛盾。

“您应该、也完全可以少穿一些衣服。”常锐对自己的父亲以“你”和“您”交互相称，而对郭天谷却从来冠以“您”：岳父毕竟是岳父。血缘就是血缘，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可替代，不可置换，并且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血缘关系完全一样。在两个人组织起一个家庭时，他们各自的血缘关系也随之叠加。但后天的叠加永远不能等同于先天的分配，不信你看离异之时，两张皮很容易地就分开了，没有任何粘连。

郭天谷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他是前G省财政厅的副厅长，南下时就是可以带马和警卫员的干部。多年身居高位，使之养成了不动声色的习惯。而且要处理好和女婿的关系，是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必须保持距离。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多穿一些？”常锐从岳父的脸上读出了潜台词。中国是一个潜台词丰富的国度，而他则是识读的专家。

“我没有这样说。”郭天谷说话的速度适中，音节和音节之间没有任何粘连。

“如果我这里有空调机的话，就可以穿上羽绒衣。”常锐这话是有所指的：一个月前，他的朋友刘科拿来一台空调机，日本东芝牌，开价1000元。“为什么这样便宜？”他至今后悔这句话。“没有上过税。”刘科坦然地回答。

郭天谷因此就不同意买。在没有税务局时，这项工作就归财政厅管，而他正是分管者。“你们都应该去学学税

法。”就在前一天税务局的局长还说要请他给一个税法学习班讲课。

“我有一个朋友是作小买卖的，被命令去上一个学习班。刚才我在路上遇见他，他给我看了发给他的一大叠学习材料，我粗略地翻了翻，尽是些这个法那个法的，于是我告诉他：如果你真的把这些全都学会了，买卖也就跟着垮台了。”刘科因为一向顺利，所以说话相当随便。“按照目前的税务政策，一般作买卖的人至多是小康而已，绝对发不了大财。”

“如今有谁不偷税？”郭夏知道这话已经伤害到父亲的职业自尊，自己必须出面打圆场。“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是很难过的。”

郭天谷没有再说话。只是在第二天说要去曾经搞过地下工作的上海转一转，看看老朋友。于是郭夏退却了，“空调机以后可以再买，而我只有这一个父亲。”

“更何况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女儿。我只有一个老婆。不就是买一部上过税的吗？”常锐宽宏地说。任何一部成功之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妥协的历史。妥协就是进步。

“我看过一本小说：一个”常锐把“很封建”三个字删除掉。“父亲甚至不肯当着女儿的面洗脚。”

“如果这个家里没有康定的话，自当别论。”郭天谷说。

“康定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子而已。”这个康定是他们

雇的小保姆。有一个很复杂的藏族名字，因为她是康定人，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直呼她“康定”。

“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郭天谷关了电视。他的逻辑相当清楚。

康定及时地开出晚饭来。因为八点钟郭夏要去夜校上课。她是S大学法律系的讲师，同时兼任夜校的老师，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去上课，每堂课能挣四十元钱。而这笔钱是这个家庭必需的：从北京调到S市来后，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幢房子，连利带本压得他们够呛。

在一般情况下，郭夏总要对饭菜评论一番。一个过于能干的妇女和一个因能干而霸道的领导一样，根本不适宜给他们配备副手。尤其是来自康定的副手。可今天她沉浸在“皮尔·卡丹”制造出来的欢乐中，无暇它顾。

“皮尔·卡丹”是伟大的。尽管它只有200元钱，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伪“皮尔·卡丹”依然能制造出巨大的欢乐来。

“刚才是谁的电话？”

“我的一个学生，是工商局的科长。他的法律课得了五十九分。想要改分。他先托了我们系主任，我不给他改。他又转托了分管后勤的李校长，我还是不给他改。刚才他打电话来，苦苦求了半天。”

“你给他改了没有？”郭天谷问。

“没有。”郭夏说了一句违心的话。

郭天谷赞许地点点头。“南下从小就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他一直叫她“南下”，虽然自从嫁给常锐后，因他嫌“南下”太有战争色彩，就改了。

一个人活得比他所属的时代长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你应该给他加上一分。三十八岁的科长，之所以让你们那个夜校，还不是为了那张文凭？怪可怜的。”常锐说。“其实破文凭有什么用？”他不禁想起自己来：正牌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到了S市不也只是在保险公司当一个小小的职员？

“有些东西只有在没有它时才觉得有用。”五年前是郭夏提出要来这个新兴的S市的。因为一来这离父亲比较近，二来这在当时的传说中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可来了之后，不过是物价和工资作了一次同步调整而已。去开公司作买卖吧，没有资本不说，主要是没有背景，弄得常锐一副“羞见江东父老”灰溜溜的样子。这就形成一种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尤其是债权人从来不提，作为债务人的她则更感内疚。“他跟我的开篇词才有意思呢：郭老师，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咱们是不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一谈？亚园酒店怎么样？”她从小东南西北追随父亲的宦辙，因此颇有语言天赋，学S市人说普通话，确实是维妙维肖，连“一笑黄河清”的郭天谷也动容了。

郭天谷虽然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但依然牙如铢，胃如磨。纳入的速率极高，吃完就径自下桌去了。

常锐的住宅是三室一厅，因为郭天谷和康定的加入，他的书房顺理成章地被挤压掉了。可若干年来，他读书已经成了习惯。所以他渐渐地把阳台布置成书房。

深夜一点，他还在阳台的躺椅上读书。手中是一本英文版的《世界近期经济概论》，旁边是一张茶几，一杯乌龙茶，一盏万向的工作灯。

“不去睡？”身着绸睡衣的郭夏已经小寐了片刻。

“不。”回答是简短的。

郭夏走后，常锐关了灯，进入了一种“伪睡眠”状态中。

金钱是一种权力，起码可以说它能派生出权力。曾几何时，世界的一半财富都集中在美国。可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一夜之间，仅用一条管道就从美国和欧洲吸走了数十亿美元。这些美元在中东稍事逗留，大部分就迁居瑞士和回到了纽约的银行户头上。紧接着它们又以贷款的形式进入阿根廷、秘鲁等国家，它们再以向美国购买技术和设备的形式再度返回。不同的只是换了一个户头而已。再以后，因为美元贬值和世界贸易格局发生变化，资金汇集东京后再折身去美购买房地产和各种政府债券。以至于美国各报刊惊呼：日本准备买下整个世界。

财富的每次转移，都带来权力的转移。当钱在阿拉伯时，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银行家都集中在利比亚、科威特

……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特别得到提高。当钱到了日本时，政治家和银行家立刻到了那里去，日本一反以前小伙计的角色，敢于对美国说“NO”。没有财富就没有权力。如何获得财富呢？获得财富积聚财富显然不是一种罪恶，只要手段合法。

整整一夜，在常锐的耳边都响着各种资本在高速流动中发出的尖锐啸叫声。

几十年来，时尚变过来又变过去，可记录在常氏家族遗传密码上的进取心却没有变：它只是潜伏着、等待着、渴望着。

郭天谷也没有睡。他的卧室就在阳台旁边，女儿女婿的对话听得相当清楚。他在黑暗中隔窗看着常锐。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可我总是觉得他的内部有一种不安静的成分：他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以出身来决定一切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出身也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必须设法控制这种成分的比例。当然不要超出自己的权限：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第二章

S市市长办公室。

方市长是一个有一张典型南方人脸形的中年男子。1960年以福建省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毕业之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只能下到基层。先是在G省的一个大型矿山作技术员。文革一完，就科长、处长、科委主任、省政府秘书长，一路升上去。后来到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作副主任。这是一个副部长级的位置。他上学时的系党委书记不止一次用他举例说：我们清华毕业的学生，就是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给他们的不是干粮，而是猎枪。

在当S市的经济改革一度陷入低潮时，北京方面把他给派来了。“京官南下，必有作为”，当地的一些报纸颇感鼓舞。可没有多久，报界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他似乎对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即使不能操纵舆论，起码也不能被舆论所操纵。“舆论是民众的呼声，可呼声是不是

就是民众内心真正所想的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一个司机驾驶一辆载满乘客的车时，后面不停地有人说该向左拐、该向右拐，或者是该刹车、加速。然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机，他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做才是对的。”这是他在一次小型的会议上的讲话，并且禁止与会者披露给报纸。

此刻他正约见市政府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董一。

“我有一种感觉：近来S市的经济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你的感觉相当准确。”董一说这话时，稍稍有些嘲讽的味道。就是因为这种味道，使得他在科长和处长的位置上逗留达二十年之久。“全国经济形势同样严峻：外债达400亿美元，内债达800亿人民币。去年全国的总收入是2800亿，而总支出则是3014亿。不折不扣的赤字经济。”

董一对数字的记忆力是第一流的，方市长一开始时不相信，因为在他上学时，他们系的食堂管理员，在向领导汇报时，连一盆菜能打多少碗都知道，而这种事情是随机性质极大的，可后来这个人就得力于这种“罕见”的记忆力，官至学校的行政处长。所以在头几次他听董一引证数字时，持怀疑态度。悄悄地查证过不下十次后，方才相信。“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办法，刺激它一下。”董一是他从北京带来的干部，也是唯一一个——只有那些没有本事的领导人，才带很多属下到一个新单位去——他之所

以带他来，除去他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头脑外，更主要是因为他是有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这点在目前尤其可贵：当你成为一个独立单位最高首长后，在你的视听范围之内，几乎就听不到不同意见。你所有的谋士，几乎都时时刻刻在揣摩你的心思。这种现象古已有之，而于今为烈。可你如果想作好一件事，身边有一个“诤诤之士”是必要条件。所以董一虽然直到现在还不是党员，但有许多问题在上常委会之前，他都要以一种商量的态度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在去年就提出过：企业没有活力，其主要原因就是资金不足。而资金不足就造成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务链，极大地影响生产力。”董一侧身避开阳光，“至于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真正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S市1985年就有，可是因没有动力，一直是不死不活的。

“用股票市场来吸取全市、以至全国的闲散资金是一个好办法。”

“然而我记得你当时在我的计划上是这样批的：暂不议。”董一跷起他的著名“二郎腿”，这是他的商标。有一次方市长开玩笑说：“你在全中国，很难找到有十个能接纳你这基辛格式二郎腿的上级。”他当时反击：“如果在你的办公室里，有十个这样的人，你的工作就会好做的多。”

“请注意我用的这个‘暂’字。”方市长知道对于一个

优秀的知识分子，你只有“国士待之”，他才会“国士报之”。“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这样做。”他所谓的政治形势，撇开大形势不说，主要是指市委的苏副书记为代表的一批持不同观点的人。当时市委书记的位置是空的，而苏则是很有希望的候选人之一。而上个月北京方面已经内定由他兼任S市党代会筹备小组的组长。任何有党务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等于宣布了他当书记。这样一来，形势立刻大不同了。

“你考虑政治方面的事太多了。”董一遗憾地说。

“我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同样一件事，在某些时候不能做，而在另一些时候却非做不行。这就是辩证法。”方市长说的的确是实情：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有派别。毛泽东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但当两个派别的势力几乎相当时，这个地方的工作就很难做了。因为有一些人，根本不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而是使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斗争方法。当然，真正能进入派别内部核心的人只有很少几个，大部分人都在看风向。“如今风顺……”他是一个有尺度的人，即使在私下里，和自己人说话，也不会使用“风顺着我们”这样含义明确的词组。

“你报告中央了？”

“当然。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要你拿出一